

奶奶、炉膛和煤油灯

文/周志清

太阳在西山头，乏了，它收敛起光芒，露出倦意，懒洋洋地靠在山尖。

大地涂上斑斓的彩色，太阳的余晖披在荷锄的农人背上，发散着七彩的光芒。

奶奶屋里外忙了一天，看到院里的光淡了下来，就会停下忙碌的脚步，掸一掸围裙上的灰和土，洗净手，大锅里添上水，倒入切好的红薯块，摆上篦子，放上馍馍，点火做饭。

奶奶小脚，那是旧时代给她留下的印记，这给她带来了无尽的心酸和苦恼，也可以说是创伤。奶奶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辛劳和磨难，好在这些都成了过去。

炉膛里跳跃起欢腾的火苗，火舌舔着锅底、沿着火道、把它的余火给了后锅，再加一把劲把后锅里的水加热，还有些不老实的火苗急着穿过火道沿着烟囱跑了。炉膛里的火光投射到后墙，又返照到灶屋里，灶屋也就亮起来。

锅里的饭熟了，天也黑了，外面看不见了，屋里也看不见了，奶奶这个时候就会借着炉膛里的余火把煤油灯点亮。掀开锅，蒸腾的哈气团着、旋着冲向屋顶，瞬间灶屋里充盈着热和雾，衍射透过来的昏暗的煤油灯的光只隐约可见。有了这弥漫的哈气裹着食物的香也是醉了。

白天他种地、你上学，也就在端起晚饭时一家人可以安稳地聚在一起。就在这煤油灯下，一家人享受着一天里安静的这一刻，尽管粗茶淡饭却也嚼出滋味来，虽寡淡却温馨甜蜜。有时候为了节约那一点油，不点灯，一大家子人围坐在锅台边摸黑吃这一餐饭。习惯了这样肃静而恬淡的生活方式却也觉得虽平常却滋味香甜。

锅里的食物填充家人的胃，温馨晚餐弥足珍贵。

奶奶大都是最后一个离开锅灶，拐着小脚，端着家里唯一的煤油灯来到堂屋，放到堂屋的桌子上，光虽弱却驱走了黑暗，把堂屋照亮，黄色的光透过夹墙的缝隙也给里屋带来斑驳的光线。

家里人大多时候是吃过晚饭就入睡的。若有事就会在堂屋里就着煤油灯的亮把事来说。人说着事，煤油灯的光这时就会开起小差，它会钻过门缝，来在屋外。从门口溜出来的光刚出来时还是很亮的，它聚在门口一字排开，像一排哨兵立在门口，笔直笔直的，兀立着宣示自己的存在，静悄悄看守着自己的地盘；溜到树上的光会显出树婆娑而威武的身影；溜出来的光走到大路上已经分不清是月的光还是它了；溜得在稍远一些的光就连模糊的光辉也不见了，它彻底的脱离了煤油灯回不来了。

点着煤油灯，就着昏黄而温暖的灯光说话，爹娘有一搭没一搭的商量个事，你一言她一语的是催眠的曲。这个时候奶奶一般不说话，一边借着昏暗的灯光摸索着干起杂活，或缝缝补补，或用锥子剥起包谷棒上的粒，积攒起来留待来日磨成苞谷面以备一家人充饥。平时家里其他人各司其职，工作、劳动、上学，唯独奶奶在屋里默默地操劳，承担起后勤部长的角色数十年如一日，支撑起这个家的安稳，托起家人回还避风港的安逸。

我瞪着眼摆出好奇的神色听着，不大一会就睡意袭来，哈欠连天，却在大人一再的催促下还摆出一副认真、仔细倾听的模样。无奈装样子是装不长的，随着时间延长，苦等大人一起睡觉的想法一再更新，也只有先上床睡了。

记忆犹如奶奶在我那走线的破衫上纳的针脚，行线跳来跳去的一针宽来一针密，皱皱巴巴难以抚平。回忆的闸门开启后如哽咽的喉管整出的腔调，还有那无穷尽的时光下难以拖回的情感碎片催发我凄楚的感觉。

回访

文/陈健

手机响了，一看是龚主任打来的，两个月前在医院里给我做手术，他是主刀。

“陈健吗？现在在哪？”“在单位。”“你的手术做了有多少天了？”“1月5号到现在已经70多天了。”“一会儿我们去看看你。”

听他这么说，我不好回绝，但总感到有点多此一举。

10点多，龚印华主任、吕世高医生，还有在医院照顾我的护士长等一行五人来到我的办公室，让我撸起那条做了手术的坏腿，认真地看了看，问道：“你什么时候丢的拐？”“前天。”我又补充说：“拿着拐骑电动车、上楼都不太方便。”“70多天，按说可以丢拐了，但是你的骨质不是太好，就像修路一样，路基不是太牢固，为了保险起见，你还是再坚持一段，等到90天以后再丢。”龚

主任望着我，一脸真诚。

是啊，行百里者半九十。丢拐虽然只有两天，然而走路用力时还偶有不适，万一因为用力太早，腿部手术部位再出现问题，岂不是前功尽弃，到时就是后悔也于事无补。

临别，内心涌起阵阵暖流。我非常清楚，他们供职的淮河中医院离我所在的单位大约有将近10里路程，能够放下手中的工作专程对我这个曾经他们服务过的患者进行回访，既体现了医院的关心关爱，又不可辩驳地证明他们有着以患者为中心高度责任感。

我起身要送他们出门。“你坐这，不用了。”两次，他们都阻止不让。非常明白，他们是在为我考虑，为我的腿考虑。

他们走了，我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在淮河中医院10多天治疗的日子里，一幕幕浮现在眼前，是那么温馨，那么感人……



回忆母亲

文/林国英

我自幼被寄养在姑姑家，直到初中毕业才回到父母身边，与母亲一起生活了4年。

1958年，我考上了驻马店高中。家中兄弟姊妹多，家里十几号人的生活来源主要靠我父亲工资维持，生活十分艰难。当时大哥正在部队服役，大姐也因家庭困难15岁就参加了工作，每月的工资全拿回来交给父母亲，我的大弟弟14岁也辍学去工厂当了学徒工，全家的生活全靠母亲安排。母亲当时40岁，她出身贫寒，是七姊妹中最小的一个，159cm的个头，长着一双大眼睛，双眼皮，一双被包裹过又放开的双脚，只是脚前端有些尖，走起路来很利索。可能是我那比较开通的姥姥不忍心小女儿受缠绕包裹的痛苦，发了慈悲给母亲放了脚，使她成了远近闻名的大脚丫头。母亲端庄贤淑，脸上总是挂着笑容，印证了她从不向困难低头的性格。

我们家总是老大穿过的衣服老二穿，吃饭也是先让着小的。为了增加收入，母亲也找了一份工作，每天起早忙完家务，就一手抱着3岁的小弟，一手牵着5岁的五弟，小跑着往缝纫厂上班。为了我能在学校食堂搭伙，家中硬是挤出一点钱为我交纳每月7元钱的伙食费。我在学校吃饭，晚自习后，回到家已是9点多钟，母亲还在缝补衣衫，忙做家务。很多时候，母亲见我到家，总会从锅里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或小米稀饭，让我饱餐一顿。写到处，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，我又一次被伟大的母爱所感动。为了我能安心学习，母亲从未安排我做什么，只是靠我自觉地找一些事来分担她的家务——我向母亲学会了勤劳和坚韧。

母亲没有读过书，她是平凡的，又是伟大的，既有中国劳动妇女勤劳善良、淳朴的美德，又具有聪慧宽容的性格特点。她性格内向，不善言辞。她含辛茹苦，合理安排，养育着9个儿女。为了儿女们的吃穿，她费尽了心机，不知疲倦地操劳着。儿女们的衣服、鞋帽都是她一针一线缝制的。

记得有一次，她为我大哥添置了一条裤子，我也想要一件连衣裙，母亲说等一等，可能是她不愿让我失望而做的缓兵之计，一种托词，但我看到了5岁的五弟穿着用两块手绢缝制的汗衫，3岁的小弟穿着露着膝盖

的裤子时，我无言以对。从此，我再也没有为自己提出过什么要求，直到参军入伍——从母亲那里我学会了理解和宽容。

母亲在乡下长大，娘家有一群穷亲戚，对穷苦农民有着天然的同情心，只要能帮助，她会尽力而为。我经常看到，每当中午快要吃饭的时候，总有一两位乡下亲戚到家里来歇脚，不管是近亲或是远房亲戚，她都笑脸相迎，安排他们坐下，给每位来客端上一碗面条或其他饭菜，请他们用餐。客人会谦让着说不吃，不吃，可大家都心知肚明，他们是来蹭饭的，总是劝说他们吃下。这一餐，照例是母亲饿着肚子，因为10个人的饭有12个人分摊，怎么够吃呀！有时，正在吃饭时，来了讨饭的，母亲会自己少吃或不吃，也要打发他们，或盛一碗饭，或送半个馒头——我从母亲那里学会了与他人共情，爱人助人。

1961年，我高中毕业应召入伍。去军校报到的时候，母亲带着几个弟弟妹妹，送我到火车站的站台上，当时我只顾高兴，没有体会到母亲的用心。以后我每几年回家探亲一次，每次回到家乡的时候，总能看到母亲领着几个弟弟妹妹在站台上等我，归队时，母亲带着弟弟妹妹到车站送我，一直等到车开了，她挥动着手臂向我告别，我知道，尽管她儿女多，但对哪一个都充满了爱。直到多年后，母亲的这份爱和这种行动，一直温暖着我，铭心刻骨，深入骨髓。母亲让我学会了爱的传递，撒播温暖。

我每次探亲，母亲总是陪着我，带点小礼物，到亲戚家走一走，去看望他们，街上的二姨、三姨、农村的表嫂、舅舅、妯子等，他们都不富裕。一方面，她是想让亲戚们看到我的进步，另一方面，她是教育我不要忘本，要有爱心。母亲的身教胜于言教，我常常被她博大的胸怀所感染，对人，不分贫富贵贱，一视同仁。母亲教我明事理，不要忘本。

我的家庭充满了和谐相爱的气氛，父母从没有有在子女面前吵过架，我们都没有挨过父母的打骂，他们以理服人，对子女教育有方。母亲曾被评为模范母亲，各种奖状挂在墙上。

母亲没有享到几天福，在我们兄弟姊妹都有了自己的事业，能够供养父母时，母亲度过了她85个春秋，离开了我们。

我敬重母亲，深深地怀念她！